中正漢學研究
2025 年第一期（總第四十五期）
2025 年 6 月 頁 25~52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從「殖民」到「公民」：
梁啟超的「南洋」經歷、華僑想像與建言

許德發*

摘 要

晚清以來，在內憂外患底下，中國尤其是來自華南閩粵二地的華人大量移植南洋，形成了一個中國大陸以外最大的海外華僑社群。隨著地理知識之提升、出洋考察之普遍、領事使者之外派以及知識人出遊與流亡，「南洋」以及僑居此地的華人益發進入中國知識界的視野，其中包括作為中國近代重要思想家、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梁啓超於 1899 年在逗留日本時期撰寫的〈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一文中認為，中國人「富於自治之力」，如南洋各埠華人，他們也具「有冒險獨立之性質」。到了 1905 年，他在〈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中，從中國民族精神建構與「新民說」角度出發進一步論述了華人在海外的拓殖，而此「八大偉人」實無一不來自南洋，這形成了他自身中國本位的「南洋」與華僑之視野與理念。然而，到了 1919 年歐遊途經馬來亞時，梁啟超似乎對南洋尤其是馬來亞與華僑之立場有頗大轉變，他轉而勉勵華僑提升政治與建國參與，呼籲他們思考自身的在地前途。值得我們叩問的是，梁啟超的「南洋」視野淵源何自？他的「南洋」實際經驗如何？其「南洋」華僑之視野或轉變是建立在怎樣的理念與思想之上？簡言之，本文嘗試追溯梁啟超的南洋經驗，並試圖梳理其「南洋」與華僑知識與理念之實際內涵與建構，以揭示其「南洋華僑」的想像、知識與理念之局限與啟示性，尤其是指出其理念與馬來亞華人「政治參與」的思想系譜之相關聯。

關鍵詞：南洋視野、華僑、殖民、公民、自治

* 馬來西亞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副教授。

From Colonization to Citizenship: Liang Qichao's Nanyang Experience, Imagin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Political Propositions

Khor Teik Huat*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period, amid internal strife and external threats,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especially from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migrated to the Nanyang (Southeast Asia), forming the largest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outside mainland China. As geographic knowledge expanded, overseas investigations became more common, consular missions were dispatched, and intellectuals increasingly traveled or went into exile, "Nanyang" and the Chinese residing there came into clearer focus for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sphere. Among these intellectuals was Liang Qichao, a prominent thinker of modern China who lived in exile in Japan. In his 1899 essay "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Race" written during his stay in Japan, Liang asserted that Chinese people possessed a strong capacity for self-governance. He viewed the Chinese in various Nanyang ports as embodying a spirit of adventure and independence. By 1905, in his work *Biographies of Eight Great Chinese Colonizers*, Liang elaborated further on overseas Chinese expa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pirit and his "New Citizen" theory. Significantly, all of the eight figures he profiled were pioneers in the Nanyang region, revealing Liang's Sino-centric conceptualization of Nanyang and overseas Chinese. However, by the time of his journey to Europe in 1919—during which he passed through British Malaya—Liang's stance toward Nanyang, particularly Malaya and its Chinese sojourners, appeared to shift markedly. He began to encourage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engage more deeply in politics and nation-building, urging them to consider their local futures. This raises a series of important questions: What were the sources of Liang Qichao's vision of Nanyang？ What was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his actual experiences in the region？ How were his views on overseas

* Associate Professor,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Malaysia.

Chinese shaped, and how did they evolve over time？ In short, this paper seeks to trace Liang Qichao's experiences in Nanyang and analyze the conceptual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his understanding of Nanyang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t aims to illuminate both the limitations and the insights of his imagined and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with Nanyang Chinese,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the genealog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Keywords: Nanyang perspective, overseas Chinese, colonization, citizenship, self-governance

一、前言

近代以來，西力東漸，不論在軍力與文化力上中國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國內政治亦顯腐朽，積弊叢生。在這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底下，加以西方列強亦在東南亞開辟商埠，將之納入世界殖民貿易體系，中國人尤其是來自華南的粵、潮、閩、瓊與客人開始大量移居南洋，形成了一個中國大陸以外最大的海外華僑社群。同時，隨著晚清地理知識之提升、出洋考察與留學之普遍、領事使者之外派以及知識人的出遊與流亡，「南洋」以及僑居當地的華僑益發進入中國知識界的視野，其中包括中國近代重要思想家、流亡日本的梁啟超（1873-1929）亦開始關注華僑社會。實際上，南洋是近代中國政治場域鬥爭的延伸，革命、維新或保皇兩派就把論爭與勢力轉移到此，南洋華僑成為他們理念訴諸的對象，梁啟超的老師兼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即流亡到馬來亞多年，孫中山亦多次南來宣傳革命。

在 1899 年流亡日本期間，梁啓超開始撰寫有關南洋華人或海外華僑之篇章。他在〈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一文中認為，中國人「富於自治之力」，例舉「即旅居海外之工商，其自治之力量固甚厚。無論在何國皆守其習俗，不與所寓之國同化。如南洋各埠……」，在論及「有冒險獨立之性質」時，亦提及「南洋英屬、荷屬諸島為中國人最初發見者十居五六」。[1]1905 年，他在〈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中，從中國民族精神建構的角度進一步論述了華人在海外的拓殖，而此「八大偉人」實無一人不是南洋華僑。作為維新派重要領袖與輿論建構者，梁啟超從自身政治與維新的立場出發，建構了中國本位的「南洋」與華僑之視野與理念。[2]

在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戰勝國之一，徐世昌總統委請梁啟超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身份遠赴法國，開啟了他著名的歐遊之旅。他在 1919 年歐遊途經馬來亞時，似乎對南洋尤其是馬來亞與華僑之立場有頗大的轉變，他轉而勉勵華僑提升在當地的政治與建國參與，呼籲他們思考自身的在地前途。實際上，梁啟超並不比康有為或孫中山與「南洋」及當地華僑有更深遠與直接的關聯，如上所述，康有為、孫中山與新馬華僑社會淵源極深，他們對「南洋」有更具體的經驗與體會。因此，值得我們叩問的是，梁啟超的「南洋」與華僑之視野淵源何自？他的「南洋」實際經驗如何？他的「南洋」視野與轉變又建立在怎樣的理念與思想之上？許多學者指出，

[1] 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湯志钧、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第 2 集，論著 2，頁 7。
[2] 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湯志钧、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集 5，論著 5，頁 52-56。

梁啟超的南洋論述是其著名的「新民」學說的一部分，[3]但這之間是一種怎樣的思想關聯？從南洋華人角度而言，他對南洋華人的想像與論述有何具體影響？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是否具有啟示意義，並且具有某種思想系譜之關係？簡言之，本文嘗試追溯梁啟超的南洋經驗，並試圖梳理其「南洋」與華僑之知識與理念，以及他對華僑之實際了解與建言，以揭示其「南洋」經驗與想像的局限及其知識建構所具有的啟示與影響，尤其是指出其理念與馬來亞華人「政治參與」的思想系譜之相關聯。

二、梁啟超的「南洋」經驗及其視野之淵源

自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海外長達十四年，直到1911年返國為止。在此一漫長的流亡海外時期中，他才開始注意並高度重視華僑、華人所蘊涵的巨大政治、經濟力量，對海外華僑、華人社會進行了較全面的調查研究，陸續發表了一批關於華僑、華人問題研究的著作，為該領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4]學界對此大體保持肯定的評價，比如已有學者專門研究梁啟超的華僑華人研究，認為梁啟超的〈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是「中國華僑研究的首創之作」，並指出梁所著《記華工禁約》是「清末中國學者第一部涉及美國華人的著作」，「對華僑華人的重視和研究功不可沒」。[5]尤有進者，梁啟超所提出的「華僑殖民論」對「民國時期研究華僑問題的一些學者有相當大的影響」。[6]

實際上，梁啟超的華僑研究，部分得益於他的海外遊歷。維新運動失敗之後，在他流亡的十四年之內，部分基於促進保皇黨實力的原因，他除了長期居留日本之外，他也曾到過夏威夷群島、香港、南洋馬來亞的新加坡與檳榔、印度、澳洲、菲律賓、加拿大與美國等國家和地區。他因此寫下不少遊記，如篇幅較短的《汗漫錄》（後更名《夏威夷遊記》）和長篇著述《新大陸遊記》與《歐遊心影錄》等，[7]他在澳洲的遊歷當時也獲得報刊的顯著報導。[8]然而，這些遊記卻沒有專門針對他頗多論述的對象——南洋——在

[3] 陳緒石：〈梁啟超的華僑國民性研究與「五四」國民性批判思潮〉，《學術探索》第 11 期（2019），頁 130-137。

[4] 王亞生、劉勁松：〈略論梁啟超華僑華人研究之成就〉，《前沿》第 18 期，總第 320 期（2012），頁 149。

[5] 李安山：〈明清時期有關華僑華人的典籍筆記和研究概述〉，《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 2 期（2002），頁 41-47。

[6] 李安山：〈明清時期有關華僑華人的典籍筆記和研究概述〉，頁 41-47。此外，李安山〈中華民國時期華僑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第 4 期（2002），頁 307-310）對民國時期 1930 年代有關「華僑殖民」觀點也作了說明。亦參王峰，〈梁啟超著作中的海外華人〉，《蘭台世界》第 20 期（2016），頁 79-81。

[7] 顏敏：〈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南洋敘述〉，《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 2 期（2023），頁 38。

[8] 蔡少卿：〈梁啟超訪問澳洲論述〉，《江蘇社會科學》第 2 期（2018），頁 144-160。

其各種遊歷的論述中，有關南洋的記載不夠豐富，缺乏細節，甚至難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讓人訝異的是，《梁啟超年譜長篇》也輕輕帶過，相關研究亦可謂不多，基本仍欠缺直接與完整的論述。其實，梁啟超除了於1900年留日時期到過南洋馬來亞，進入民國以後即1919年他亦曾過境南洋。故此，在論述其南洋與華僑視野與理念之前，我們有必要追溯與考究梁啟超的南洋之旅。

梁啟超第一次造訪南洋是發生在1900年勤王運動失敗之後，他當時特來探訪流亡馬來亞的康有為，但他自己對此語焉不詳。在梁啟超〈三十自述〉中，也只簡略提及「七月急歸滬，……留滬十日遂去。適香港，既而渡南洋，謁南海，遂道印度，遊澳洲，應彼中維新會之招也」。[9]故此，相關研究也說法不一，有的說他去了新加坡見康有為，但也有指他們見於檳城。比如桑兵認為，「梁啟超於1900年9、10月間赴新加坡、檳榔嶼見康有為……」，[10]模棱兩可。另外一些學者則說，「他在1900年漢口起義失敗轉赴新加坡會晤康有為，自檳榔嶼遊澳洲……」，[11]甚至有者針對梁啟超到馬來亞的日期概括認為，「梁啟超的第一次南洋之行應該在1900-1901年間」。[12]如上所述，即便《梁啟超年譜》也只簡略提及，「先生居滬十日，以漢口事敗，無可補救，乃往新嘉坡唔南海先生。居若干日，應澳洲保皇會之邀，始於八日自印度楞伽島乘英國輪船，為澳洲之遊」，[13]因此學者意見含糊亦不難索解。實際上，我們可從康有為當時的行踪加以追探。康有為於1900年7月26日被英總督亞歷山大從新加坡接往馬六甲海峽內丹將頓島居住，兩週後，即8月9日又派船迎往檳榔嶼，入住總督府。英方主要出於康有為的安全考量，直到第二年（1901年）的12月17日康離開檳榔嶼去印度為止，一直讓他住在那裏。[14]因此，可見1900年9、10月到訪南洋的梁啟超，應該是在到了檳城始見康有為。

值得追問的是，為何梁啟超第一次南遊沒留下任何具體的描述？筆者閱讀了他南來時段的華文舊報刊，亦不見任何記錄。有者認為，「當是時也，其對社會改造滿懷信心，無暇顧及檳榔嶼的風光」。[15]其實，康有為當時為何被接去檳城，而且行程隱晦，

[9] 梁啟超著，湯志钧、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 4 集，論著 4，頁 110。

[10] 桑兵：《勤王庚子與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學，2004），頁 252；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261。

[11] 陳桃霞：〈新地理文化空間的發現與開拓——以梁啟超等作家南洋遊記為中心的考察〉，《學術探索》第 1 期（2018），頁 100。

[12] 顏敏：〈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南洋敘述〉，同註 7，頁 38。

[13]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同註 10，頁 260。

[14] 張人鳳：〈1900–1901,康有為在南洋——讀邱菽園後人王清建先生藏康有為致邱菽園信函及其他歷史文獻〉，*BIBLIOASIA*，9.3(Oct–Dec DEC.2013):pp.46-47。此外，王慷鼎也有相同的論述，見〈康有為南遊詩中「丹將敦島」考〉，《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報》第 1 期（1997），頁 33。

[15] 陳桃霞：〈新地理文化空間的發現與開拓——以梁啟超等作家南洋遊記為中心的考察〉，同註 11，頁 100。

已可窺知當時政治氣氛之詭異，「因懷疑宮崎行刺，康有為要求英國官員保護」，[16]同時，因勤王失敗，極可能梁啟超也因此避免公開自己的行程。當時的新馬報刊皆完全沒有梁啟超的相關報導，可佐證其行程之私密。梁啟超於1900年10月7日離檳榔嶼，經錫蘭前往澳洲，於10月25日到達西澳省之非厘文度（Freemantle），再轉其他地方。[17]1901年4月他又從澳洲經菲律賓回到了日本，再一次經過南洋，這次返程也沒有留下多少有關南洋的文字。我們只能在記錄其1903年北美之行的〈新大陸遊記〉中尋找到一些他南洋之行的線索：「六月十七嚴裝往美，忽得上海電，促之歸，遂以二十日回馬首而西，道日本返上海。遂聞漢口之變，志不遂，遂折而南，由香港而星加坡而檳榔嶼而印度，繞澳大利亞一週。辛丑四月，經菲律賓覆至日本，居日本者又幾兩年。」[18] 顏敏認為，梁啟超遊記中南洋敘述缺失的原因，可從其對「遊記」的理解稍加解釋，即與梁啟超對「遊記」社會功用的特殊理解直接相關。在〈新大陸遊記〉的凡例中，梁啟超寫道：「中國此前遊記，多紀風景之佳奇，或陳宮室之華麗，無關宏旨，徒災棗梨，本編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刪去，無取耗人目力，惟歷史上有關係之地特詳焉」，[19]可見在他看來，遊記應該具有開啟民智、改造社會的價值，而〈新大陸遊記〉就體現了他對南洋的這一處置思路。[20]

他第二次南洋之旅是隔了 19 年之後，即他歐遊時過境新加坡與檳城。由於在政治上被排擠而下台，梁啟超決定接受總統邀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會，並於會後前往歐洲參訪，並邀請張君勱（1887-1969）、丁文江、蔣百里、劉崇傑、徐新六與楊維新等人作為他的助手同行。[21]1918 年 12 月 28 日，梁啟超一行人自上海出發，因船位缺乏，丁文江和徐新六取道太平洋與大西洋，其餘五人則搭乘日本「橫濱丸」，繞過馬六甲海峽，穿過印度洋，通過蘇伊士運河，橫渡地中海，最後繞上大西洋，於 1919 年 2 月 11 日抵達英國首都倫敦。[22]很難得的是，當時的新加坡《新國民日報》錄下了他的部分行程：

> 梁任公先生此次歐洲之遊，內地各報多有紀載，惟初鮮有預悉其行期者。聞昨有某郵船抵叻，始悉任公□附搭此船。昨經駐星洲代理領事孫李二君及其交好等，均到船歡敘。談至下午五點鐘，船乃鼓□動程。其同行者為蔣君百

[16]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同註 10，頁 257。
[17] 趙令揚：〈辛亥革命期間海外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的看法——梅光達，邱菽園與康梁的關係〉，《近代史研究》第 2 期（1992），頁 52。
[18] 顏敏：〈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南洋敘述〉，同註 7，頁 38；見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湯志钧、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集 17，詩文，頁 122。
[19]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同註 18，頁 115。
[20] 顏敏：〈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南洋敘述〉，同註 7，頁 38-39。
[21] 鄭大華：《張君勱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 43。
[22] 同前註，頁 44。

> 里、張君家森兩人。另有二人，一為楊君維新，一為劉君松傑。旅況頗不寂寞云。[23]

從報導來看，可見其行程也是未公開的。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亦有所記錄，但其實也非常簡略：「我們離開國境已經十多日，却是到的地方，還是和內地旅行一樣。新加坡、檳榔嶼一帶，除了一面英國國旗外，簡直和廣東、福建的熱鬧市鎮，毫無差別。」[24]這的觀感其實與隨行的張君勱傳記所寫相近，「第二次歐遊，但是第一次舟行的張君勱是五人中最畏海行的人，一上船即解衣高臥，並將嘔器放於枕邊，以備嘔吐之用。然而數天后，適應了舟行的張君勱又以大航海家自命。船過南洋時，他目睹華僑經商之多。乃作《南洋華僑建國論》一文，盛讚華僑在海外的開拓成就。」[25] 其中「簡直和廣東、福建的熱鬧市鎮，毫無差別」、「目睹華僑經商之多」的觀察值得關注，下文將再敘。

在〈歐遊心影錄〉梁啟超還寫道：

> 船開了，經過香港新加坡檳榔嶼，一天一天的熱起來。十日以前，走津浦路線，正遇著大雪，燕齊平陸，一白仟里。十日以後，在檳榔嶼植物園賞起荷來了。我們的衣服，就好像剝竹筍，一層一層的褪，到後來穿一件白袷，還是汗下如雨。想起來人類受環境的支配，真是利害。妳不順應他，妳能夠存活嗎。現時國內大多數人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所懷的思想，豈不都是穿著大毛遊歷新加坡嗎？[26]

以上記錄只簡略告訴我們，他曾到過檳榔嶼的植物園以及南洋氣候炎熱。慶幸的是，因梁啟超的女婿周希哲當時是派駐緬甸的外交人員，梁啟超因此多次寫信給女兒梁思順，告知他路過檳城，[27]為我們留下一些細節。他原想請女兒特從緬甸過來相聚，但後來才知道路費不少，而且路途遙遠，故而作罷。依據《梁啟超年譜長編》以及《梁啟超家書》，他與女兒的相關通訊提及：

---

[23]〈梁任公之游轍〉，《新國民日報》第 6 頁，1919 年 1 月 11 日。
[24]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湯志钧、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 10 集，論著 10，頁 87。
[25] 鄭大華：《張君勱傳》，同註 21，頁 44。
[26]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同註 24，頁 88。
[27]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同註 10，頁 874。

> 先生自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啟程後，以本年一月六日抵新嘉坡，九日抵濱榔嶼，十四日至錫蘭島……。[28]

> 今日到新加坡，即以電告，想達。想去咫尺，恨不能一見也。出京時方遇大雪，燕齊之郊，一白千里。僅逾十日戾止此都白袷猶如苦熱，頗聞仰光酷暑尤甚於此，且晴雨皆以半年為期，汝在彼能慣耶，不至生病否？……正月六日 由新加坡拉蘇特旅館。[29]

> 抵星加坡時有領事作嚮導，尚能遍歷諸地，抵濱榔嶼時無嚮導者（時間亦太短），聽命於車夫，僅在汽車中過數小時耳。初欲往山頂旅館，旋以時間不足而止，極掃興也。……[30]

這裡必須留意的是，他在檳榔嶼時因時間不足以及沒有導覽者，匆匆離開，但在新加坡原來是獲得民國駐新加坡代領事孫英伯作陪，[31]故可「遍歷」新加坡，這對他影響頗大，下文再敘。梁啟超此趟歐遊於 1920 年 1 月 17 日結束，由巴黎起程歸國，18 日抵馬賽，等待船期，23 日才由馬賽首途返國，3 月 5 日抵達上海。[32]他在農曆正月 12 日（即 3 月 2 日）抵達香港，15 日到上海。[33]顯然，回程中約於 2 月下旬應該曾再一次過境新加坡與檳榔嶼，但卻沒有任何記錄。筆者查閱了這段時間的各報新聞報導，不見任何文字。只有《叻報》於 1 月 3 日報導中國代表團從馬賽首途放洋回國。[34]

三、流亡時期的「南洋」華僑知識、理念與想像

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儘管其政治活動暫時中斷，但從思想方面來說，卻是一次意外的良機，因這使得他有充裕時間發揮他的思想才華。張灝指出，在日本的幾年，是他

---

[28] 同前註，頁 875。

[29] 梁啟超著，張品興編：〈1919 年 1 月 6 日致梁思順〉《梁啟超家書》(北京：文聯出版社，1999)，頁 264。

[30]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同註 10，頁 876；梁啟超著，張品興編，〈1919 年 1 月 13 日致梁思順〉，《梁啟超家書》，頁 265。

[31] 依據《黃炎培日記》中有關 1920 年 4 月 23 日的記錄，當時領事是伍槐，副領事即是孫英伯。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卷 2，頁 57。

[32]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同註 10，頁 898。

[33] 同前註，頁 903。

[34] 《叻報》，1920 年 1 月 3 日。

的思想最富創造性的時期，首先他在《清議報》而後又在《新民叢報》上連接不斷提出一些新的觀念與思想，尤其在1902年後他比較系統地發表題為「新民」的文章，形成他著名的《新民說》。[35]所謂「新民」，意為「人的革新」或「新的公民」，這一概念存在於流亡前的梁啟超社會政治思想中，其中1898至1902年之間的個人經驗，都與《新民說》有密切關係，[36]但在日本明治維新思想的環境裡，梁啟超提出了一套新的人格思想與社會價值觀。[37]與此同時，流亡期間的梁啟超從未放棄通過政治活動實現其改革願望，因此在與海外華人社團取得聯繫後，梁啟超等維新派便考慮從數百萬海外華人中挖掘人力與財力資源，以實現其政治目的。[38]這其實即是我們理解梁啟超這一時期的「南洋」知識與理念的必要背景。易言之，「華僑」之於梁啟超，一開始即在其追求中國富強與《新民說》視角範疇內。必須說明的是，其《新民說》思想有一個形成的過程，故他對華僑的思考可說是變動的，乃其思想形成中的一部分，甚至華僑的實例成為他《新民說》思想的部分基礎。[39]

1902年，當梁啟超撰寫《新民說》及留日時，他的西學知識顯然大為增長，他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更為明顯的中西道德價值觀的差異上，其中他注意到傳統中國倫理對私德的偏重，故急需公德或民德。[40]因此不難理解，他把中國與西方對比起來。近代中國被西方海上強國的力量所震懾，士大夫一直在探索大清朝的海洋強國之路，加之梁啟超接受了西方的人文地理學和海權理論，在士大夫已有的海國與陸國看法基礎上，梁啟超對海洋與大陸兩種類型的國家作了明晰的對立性概念界定。[41]陳緒石認為，綜觀梁啟超等人的論述，中國作為大陸國家，一是重陸輕海，二是朝廷無意於海外擴張，三是政府非但不扶持沿海民間的海外拓殖，還常常打壓民間的海洋行為，四是國家沒有制海權；西方海國則相反，一是海洋是國家發展的重要一翼，二是國民勇於在海上冒險，三是政府支持本國在海外的僑民，也藉助僑民之力積極謀求國家的海上權力。因此，唯有民間與政府一致發力，視海洋為國家經略的重要場域，臨海國家才是海洋國家。[42]正是在這一「海洋國家」理念之追求與作用下，梁啟超注意到華僑在海外的「殖民」以及華僑的國民性或人格。在他而言，海洋國家謀求海權，國民的海外冒險和擴張是海權的必備要素，僑民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是國家向海外發展的根據地，故而殖民地的建設與僑

[35]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 106。
[36]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 42。
[37]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同註 35，頁 107。
[38] 同前註，頁 95。
[39] 陳緒石：〈梁啟超的華僑國民性研究與「五四」國民性批判思潮〉，同註 3，頁 133。
[40]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同註 35，頁 109-110。
[41] 陳緒石：〈梁啟超的華僑國民性研究與「五四」國民性批判思潮〉，同註 3，頁 131-132。
[42] 同前註，頁 132。

民的素質、品格、能力密切相關，如華僑能力、才思、野心兼具，他們才有可能建立殖民地。有了殖民地，近代中國就有成為海洋國家的可能性。[43]他也多次認為，「海以南百數十國……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44]可見一方面梁啟超思考華僑是以中國立場出發，另一方面也使他在研究華僑時，華僑的國民性問題是其研究的一個重點。

對於華僑，梁啟超實際且具體的考察主要集中於美國、加拿大、夏威夷等地，但我們可從中看到他以此概括至整體華僑，包括南洋華人。實際上，在他還沒流亡日本之前、寫於 1897 年的〈致伍秩庸星使書〉即反映了梁啟超早期關美國禁華問題的看法。當時的梁啟超對華人在美国受到排斥的狀況認為，既有清政府衰落無能的原因，也有華工自身文化素質低下的原因。「雖由吾國勢之不振，然亦不能盡為國勢咎也」，他指出赴美華工「未嘗識字、未嘗讀書、未嘗受教化，起居飲食，言語舉動，皆有野蠻之風，故美人初年，猶有令華工入美籍之請，及其後也，反從而禁之……」，所以梁啟超認為「今日欲保華工，必以教華為第一義」，並提出了六條教化華工的具體建議。[45]不過，梁啟超到了日本後，可能因第一次身處華僑社會，又有感於華僑對祖國的關懷與支持，他對華僑評價極高。[46]他在 1899 年當中國面對被西方瓜分的危機時，在〈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一文中，他雄辯地指出中國人「富於自治之力」，例舉「即旅居海外之工商，其自治之力量固甚厚。無論在何國皆守其習俗，不與所寓之國同化。如南洋各埠……」；在論及「有冒險獨立之性質」時，亦提及「南洋英屬、荷屬諸島為中國人最初發見者十居五六……」。[47]然而，他在 1899 年 12 月遊歷美洲之後，可能目睹華僑的悲慘遭遇，他對華僑產生全新的認識，主要體現於不再將華僑與「殖民」等量齊觀。[48]在 1904 年所寫下的〈新大陸游記〉中，他已不再以華僑論證中國之強，而是指出他們的國民性缺點，認為華僑：

> 一、愛鄉心甚盛（即愛國心所自出也）：一、不肯同化於外人（即國粹主義獨立自尊之特性，建國之元氣也）：一、義俠頗重； 一、冒險耐苦；一、勤、儉、信（三者實生計界競爭之要具也）。[49]

[43] 同前註。
[44] 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湯志钧、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 2 集，論著 2，頁 7。
[45] 梁啟超：〈致伍秩庸星使書〉，湯志钧、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 19 集，函電 1，頁 466-467。
[46] 王峰：〈梁啟超著作中的海外華人〉，頁 79-80。
[47] 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頁 7。
[48] 王峰：〈梁啟超著作中的海外華人〉，同註 46，頁 80。
[49]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節錄〉，同註 18，頁 201。

在歸納了華僑的組織、職業等狀況後，梁啟超總結華僑缺點有四：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只能享受專制而不能享受自由、無高尚之目的。[50]不過他特別指出，其論述立基於舊金山華人社會，因「外洋華人所至之地，亦分兩大類：一曰白人少而華人多者，白人為特別之法律以待我，如南洋諸區是也；二曰白人多而華人少者，我與彼同立於一法律之下，如美洲、歐洲諸區是也」，[51]由此最可見華人之性質及其在世界佔有何等位置。但在其論述上，似仍涵蓋南洋華僑，所不同者如在論述華人不能享受自由時，他指陳在南洋的「英、荷、法諸國，待我甚酷，十數人以上之集會，輒命解散，一切左右悉被剝奪，其嚴刻更過於內地……」。[52]簡言之，這其實與他的「新民」觀一致，既追求「國家」思想，同時要求海外華人培養為具有自治能力的「國民」。王汎森曾精確的概括道，梁啟超在日本時期最主要關心兩個問題：「國家」及「國民」。首先，有關「國家」，梁啟超有這樣一種思維，即以朝廷、貴族、家族、鄉土為主體的傳統社會是一個「自然」的狀態，故組成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是一種「有意識」的建構工作。其次，在「國家」觀念後，自然也就引出了「國民」思想的出現，此思想認為「國民」全體才是國家真正的擁有者。由於「國民」擁有所有權，他們對國家就有了「參與」與責任感，[53]即所謂的「政治參與」以及「權利」。這一思想邏輯貫穿了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包括他的《新民說》，甚至其新史學。

實際上，自由主義概念在梁啟超《新民說》裡所倡導的公德中佔有重要位置，因此他才批評中國傳統偏重「私德」，即指中國人注重村落與族民（家族之民）概念，而缺乏現代市民精神與自治能力的所謂「公德」，因此不能適應美國的近代生活。他把權利看著是人格的一個基本內容，根源在於他上述的「國家」與「國民」觀：一個強壯的「國民」才能建立一個強大和獨立的「國家」，因此中國人缺乏權利觀念是中國衰弱的根源。[54]在梁啟超看來，自由共涉及六個問題，包括「殖民地人民能否建立他們自己的政府，享有他們先前作為母國國民時享有的那種權利」。[55]在他的「國家」與「國民」觀底下，對中國而言，特別重要的是「人民參政權利」和建立民族國家問題，二者基本是同一個問題，而這兩種自由也就是國家獨立與政治參與的自由。[56]從這個視角出發，

[50] 同前註，頁 211-212。
[51] 同前註，頁 201。
[52] 同前註，頁 212。
[53]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171、174、179-180。
[54]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同註 35，頁 135、139。
[55] 同前註，頁 141。
[56] 同前註，頁 142。

才延伸了他對海外華人在殖民地處境的關心，批判華僑身上的大陸鄉土「私德」。這一論述其實延續到他 1919 年他再訪南洋時的看法，下文再述。

此外，張灝指出在梁啟超的《新民說》中，由於他對「力本論精神」的關注，使得他必然把「進取精神」看成是新民的一個必備美德，這其中包括了冒險精神。[57]因此，寫於 1905 年的〈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是梁啟超為南洋開發史上作出偉大貢獻的華僑華人領袖所作的列傳，亦是他藉以宣揚其此一精神的方式。在這篇一萬四千餘字的文章中，梁啟超從《明史》、《明通鑑》、日人本村三郎《暹羅史》等國內外典籍中輯錄了關於八位華僑首領開國、或反抗西方列強統治的歷史事跡，其中包括三佛齊國王梁道明、「與緬人三戰，三破之，盡复故地，暹民戴為王」的暹羅國王鄭昭，以及率眾戰勝柔佛與檳榔嶼土著，但面對「有強大之政府以盾其後」的英人，「不得已乃以領土主權歸諸英，而僅自保其土地所有權，納租稅於英政府」的英屬海峽殖民地開拓者者葉來（即葉亞來）。[58]沈松僑認為，此文是梁啟超為了論述其「國民」之義，乃上下求索、遍搜典籍而成，[59]重點在於說明「此諸人不藉政府之力，手闢草萊、建國稱王的殖民偉業，極盡欽仰之忱，乃至以之與摩西、哥倫布等西方殖民英雄相提並論，譽之為足光國史之偉大人物」，然而梁啟超指出，這些人物卻被忽略，甚至連名字也少人知曉，「無乃即中國民族見擯於今日生存競爭界之表徵也」。[60]他因此進而闡明國民殖民事業與政府之獎液密不可分。然而正如前述，相對於美國華人，他曾實地考察，但對於南洋，卻無暇深入到訪，只憑著印象甚至想像、或資料收集來剖析，故其史實陳述顯然多有誤失，如上述有關馬來亞華人熟悉的葉亞來之敘述即呈顯而易見的錯誤，包括指葉亞來家鄉是嘉應（實為廣東惠陽）、爭奪礦區被誤置為柔佛州（原為雪蘭莪州）、戰事發生在柔佛與檳城（實亦於雪蘭莪州），其實與葉亞來起衝突者也並非柔佛蘇丹。美國學者 Sharon Carsten 認為，梁啟超比較興趣的課題是成功的殖民者，他要告誡的是「中國民若喪失英雄崇拜的精神，中國將面臨危機」。[61]簡言之，以上論述說明，梁啟超的華僑論述在其中一個層面上是他「新民」建構所需要的基礎。

---

[57] 同前註，頁 126。

[58] 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同註 2，頁 52-56。

[59]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2000），頁 142。

[60] 同前註，頁 142。

[61] Sharon Carsten：〈從神話到歷史——葉亞來和馬來西亞華人的英勇的過去〉，李業霖編《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7），頁 199。

四、參政與建國：

梁啟超於 1919 年對馬來亞華僑的建言及其思想系譜

從以上論述可知，梁啟超基本上對華僑與南洋的思考，不脫其《新民說》之思考框架，也從為中國尋求富強的角度將華僑納入其思考範疇。然而，1919 年進入民國之後，他對南洋與華僑有了新的思考。如上所述，梁啟超有關南洋的論述最有名者當屬「殖民南洋論」，1904 年他如此說道：「亞洲東南一大部分，即所謂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島者，實中國民族唯一之尾閭也，又將來我中國民族唯一之實力圈也。以今日論，其政治上之實力，白種人戶之；其生計上之實力，未或能與吾競也。」[62]然而，他在〈歐遊心影錄〉中卻轉而呼籲馬來亞華人「建立南洋新國」，「……住在這地方，就要管這地方的事，因為和我有利害關係」。文中他提到：

> 至於南洋新國，也是民族自決的一條正路，海外僑民，文化幼稚，還須內地人助他開發。從前也有過些人設法勸導華僑贊助國內運動，這個固然是好。但國內的事情，還是應該國內人多負些義務，華僑卻有他自己應做的事，什麼事呢？還是那句老話：「我住在這地方，就要管這地方的事，因為和我有利害關繫。」[63]

什麼因素直接造成這樣的轉變？這可能與他經過新加坡與檳榔嶼時，所見都是華人有關。

> ……我們離開國境已經十多日，卻是到的地方，還是和內地旅行一樣。新加坡檳榔嶼一帶，除了一面英國國旗外，簡直和廣東福建的熱鬧市鎮，毫無差別。開大礦的麼，中國人。種大橡皮園的麼，中國人。大行號麼，中國人。雜貨小販麼，中國人。苦力麼，中國人。乞丐麼，中國人。計英屬海峽殖民地三州，中國人約二十六七萬。歐洲各國白人合計，不過六仟八百。[64]

[62] 梁啟超：〈中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梁啟超全集》第 5 集，頁 134-135。
[63] 顏敏：〈晚清域外游記中的南洋敘述〉，同註 7，頁 39。
[64]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同註 24，頁 88。

他從而指出，南洋英屬馬來亞殖民地三州、保護地四州華僑合計二百萬、荷屬印度尼西亞三百萬、暹羅安南等處三百五十萬，總數八百五十萬，而這與南斯拉夫、比利時兩國的人口大略相等，比匈牙利、羅馬尼亞略少，但又比荷蘭略多、比瑞士希臘約多一倍。梁啟超善於中西對比，不禁感嘆道，「唉，他們都是和英法德美分庭抗禮的一個國家了。再者美國十三州聯合建國時，人數也不過幾百萬。他們當初也不過因為在家鄉覓食艱難，出外別謀生路。那動機正和我們去南洋的一樣。如今是怎麼一個局面囉呢。比起來正是羞得死人。」[65]然而實際上，梁啟超僅從沿岸的海港觀察而有「都是華人」之印象是一種錯誤的想像或認識，因當時的人口數據顯示，華人並未佔多數。而且他以「白人」人口作為對比，更是忽略了馬來亞複雜的人口政治。依据馬來亞十年一次的正式人口普查，1921 年馬來亞半島包括海峽殖民地檳城與馬六甲的華僑人口，約近 85 萬 6 千人，僅佔 29.4%，馬來人則佔 54%，人口近達 1 百 57 萬；[66]新加坡華僑則計 31 萬 7491 人，馬來人口有 5 萬 4426 人，[67]顯然整體上並未佔絕對優勢。

值得關注的是，梁啟超進而言道，這樣的「都是華人」竟使得「我們在船上討論到這些情形」，其學生「張君勱就做了一篇文章，論中華民族南洋建國問題。我想我們中國人，直到如今，從沒有打過主意要建設自己的國家。不然，何至把本國糟到這般田地。四萬萬人尚且不成一個國，七八百萬人更何足道」。[68]在此引出了前述的「我從前說的一個原則。所謂『我住在這地方就要管這地方的事。為什麼呢？因為和我有利害關繫。』」，他故而批評：

> 我們中國人就向來沒有認得這個原則。倘使認得，我們不知建了多少國了。我從前又說的，「我們能夠建設北京市會、豐臺村會，才能建設中華民國。」我如今再說一句。我們能夠建設廣州汕頭廈門市會，自然能建設南洋新國。如其不然，甚麼話都是白說。好在我國民也漸漸自覺了。我敢信我們中華民國，不久定要建設起來。至於南洋新國，也是民族自決的一條正路。海外僑民，文化較稚。還須內地人助他開發……。我想我們青年，若是那位有興致，去傳播這種思想。拿來做終身事業，倒是男兒報國一件大事哩。[69]

[65]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同註 24，頁 87。
[66] Manjit S. Sidhu and Gavin W. Jones, *Population Dynamics in a Plural Society：Peninsular Malaysia*（Kuala Lumpur：UMCB Publication, 1981）, p.30.
[67] 文崇一：〈新加坡華人社會變遷〉，《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28 期（1969），頁 7。
[68]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同註 24，頁 88。
[69] 同前註。

實際上，正如前述，梁啟超自身就在留日期間，遊歷各國成立保皇會，呼籲華僑支持與贊助維新派活動，而非呼籲華僑「住在這地方就要管這地方的事」。

至此，我們有必要追問梁啟超所提及的，他們在船上討論之後張君勱所寫的論中華民族南洋建國的篇章。實際上，我們已經無法索知他們在船上討論的整體氛圍，但張君勱題為〈海外中華民族之前途〉的篇章透露了一些細節。文章以全版方式刊於《時事新報》第一版，或可說明作者與編者對文章的重視。[70]文章所論基本與梁啟超所見略同，所引述的人口數據也幾乎一致，同樣都呼籲華僑創立新國，更重要是梁啟超還撰寫〈跋〉誌於文末，可見極可能此文正是他們在船上所論的共識。此文副題是〈英屬馬來群島之觀察〉，論述內容完全就是針對馬來亞，文章開宗明義指出「吾聞國中留心海外華僑生計者眾矣。為華僑籌教育者有人矣，雖然南洋吾國民族問題，決非生計教育一二端所能盡也。以余所見，為吾族在南洋永久計，闕在團結吾族而建一南洋新國而已」。[71]文章提到，

> 頃自香港至新加坡、檳榔嶼，證之耳目所觸，友人所告，英屬馬來三府之地，吾族勢力之偉大，迥非常人意想所及。決非貿遷有無，圖什之利而已。蓋生於斯、居於斯、葬於斯，而此地之主人翁也。[72]

對照以上梁啟超所言，此行「所見都是華人」或「吾族勢力之偉大」對二人可謂是一大「震撼」。張君勱羅列了華裔在海峽殖民地三地黃白人口，提及「……以吾所聞於新嘉坡領事孫君者，此三州之地華僑約為二十萬至二十六萬之間……」，[73]可見當時民國駐新加坡代領事之接待以及給予的訊息恐怕在此中發揮了極大作用。聯繫到梁啟超致給女兒家書所提及的「抵星加坡時有領事作嚮導，尚能遍歷諸地……」，再依據張君勱文章中的說法，更可證當時的領事對他們的馬來亞之理解的作用。

張君勱此文除了介紹當時馬來亞十州的政治管理區別與歸類外，亦認為「吾同胞凡二百萬，佔十分之六七，如是，此等地不能視為馬來英國之地，乃吾華夏領土之延長」，「然以三百萬人口所聚之地，□其有何政治組織，則一無所有而已。以比利時論，人口不過數百萬，儼然一國也。以巴爾幹半島諸國論，人口不過數十萬，亦儼然一國也。」張君勱因此認為，「吾中華民族有兩百萬之人口，而一無政治組織，則何以故？曰政治能力之缺乏為之也」。再者，他亦指出，新加坡、吉隆坡各地，有開礦者、農夫、有洋車夫、

[70] 張君勱：〈海外中華民族之前途〉，《時事新報》第 1 版，1919 年 2 月 13 日。
[71] 同前註。
[72] 同前註。
[73] 同前註。

有貧無立錐者、有富等王侯者，然他們只知道個人之營業，獨不知所謂政治與公權力。他驚嘆於「此等土地上為農夫者吾族也，為商人者吾族也，為礦主者吾族也，其生計能力之發達，真令人驚嘆不已」，並指謂華僑與中國人一樣，「吾祖國為四萬萬人生息之地，除大多數愚民與夫爭權奪利之官僚軍人外，又豈有所謂政治」。[74]他繼而論證道，華人是「此諸地之主人翁」，引述了英國官員哈利遜《Guide to Federated Malay States》所說的，馬來各州道路、鐵路、建築、灌溉、礦業、漁業都是因華工所貢獻所致。又指出因孫中山與康有為「欲以海外僑民資財促內地之改革」相互詆毀，造成華人分黨派，而反觀英國人到了上海則政治意見擱置一旁，只注意全體僑民利益。他最後呼籲「兩黨之領袖，速將海外黨會，概行撤銷，而以全力發達吾族之智識、增進吾族之團結者也，世之愛吾族愛華僑者，其速圖之」。[75]

對張君勱而言，「今之論南洋僑民者，謂當注重生計教育，此言是矣」，但他認為，「抑令其爭得一有參與政治之權利，而為將來南洋國建設之分子耶。此□問題應先決定，然後吾族在南洋之方針，庶可云確立」。他以為華人應該模仿加拿大的法國人「雖受治於英美政府，而不失其宗教國語之自由，且得參政之公權」，「當取法加拿大之法人，不僅為所在地之寓公，當爭得一公民之地位」，「庶幾不僅為被治之器械，而進為地方的國家的分子。此則吾華僑所當自覺者也。吾民族既要求為此諸地之主人翁，當捨其廣東人福建人之鄉土觀念，而以馬來半島國之公民自居」。[76]作為一位憲政主義者，他進而建議華人爭取「廢棄『殖民政治』，而施行憲法政治」，然而又因華人缺乏智識、政治興味與代議會政治能力，他在此難得又延伸而透露出梁啟超曾提及一個重要的看法：「去年在內閣曾提議創辦華僑師範學校一所」，掌事者范靜生已訂下計劃，可惜後來辭職而沒實行。他說，據梁啟超所言，計劃中將選擇廣東、福建省或其他省份中學畢業者，接受師範教育，分派到南洋以普設小學，其中因各地地理、歷史、工商情況不同，故依據各地需要分科而教。此外，還設立實業補習學校，以養成僑民之技能，增進知識。張君勱說，「任公先生語予云，如是行之十年，則公民之基礎立矣」。[77]這顯然說明這是他們在船上的對話內容之一。張君勱最後指出，他這一提倡並非「大中華主義」，而是一戰之後國際趨勢使然，英美兩國都已指出殖民地統治最後必須許以自治權，而實行憲政已是當世政治家共同宣言。[78]他指出「馬來位於亞洲之東南，交通便利，海岸線極長，乃建設自由國之絕好地盤」，東方若多了一個自由之國，即多了一個國家可相互比較、磋磨。「故吾以為

[74] 同前註。
[75] 同前註。
[76] 同前註。
[77] 同前註。
[78] 同前註。

內地之改革與南洋國之建設，不應分先後。吾祖國與南洋同胞，其有聞吾言而興起者乎？予日望之矣」！[79]

如上已略提，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還為張君勱〈海外中華民族之前途〉此文寫下了跋記。梁說道：

> 英人殖民地凡二大別。其一，自治殖民地，如加拿大、澳洲等是。其二，直轄殖民地，如印度及馬來半島等是。南非洲本為直轄，今則成自治矣。凡各國之初得殖民地，未有不取直轄統治制者也。而久之遂不得不進為自治，則住民智識能力進步之結果使然耳。美國之於檀香山、菲律賓，或已許自治，或將許自治矣。吾族雖劣下，何至出南非洲玻亞人、檀香山、菲律賓土人之下？特吾民之僑居於外者，有兩大缺點。一則視其地如寄，未嘗為終身子孫久居之計。二則在祖國時本馴習於專制政治之下，不知參政權之可貴。僑外者更無論矣。坐此二因，故南洋僑民，雖為數極眾，且於產業界佔莫大勢力，而不免終古為人奴畜也。近二十年來，志士之遊南洋者多矣，其激勵僑民之言論亦多矣，然皆欲勸僑民使有所效於祖國，未有就地使僑民自為計者。君勱此論，所見夐絕矣。（飲冰跋）[80]

其論點基本與張君勱所述一致，但從梁啟超過去的《新民說》論述脈絡來看，或許這可說是他一貫的看法，即從自由主義概念出發，倡導中國人與華僑的「公德」所缺乏的權利人格，以及自治精神。只是在此他不再純粹將南洋華僑當著探析中國人性格的缺失之基礎之一，或僅將華僑置於追求中國富強的事業之上，而是完全以華僑自身利益出發，呼籲他們關心南洋的「此時此地」，以主人身份參與當地的建國。易言之，這仍不脫其固有的「國家」與「國民」觀，只是他要求華僑的「國家」建構不再是中國現代民族的「國家」，而是南洋新國，其「國民」亦非中國的，而是南洋「國民」。此一提倡是否有造成直接影響值得進一步探究，當時著名教育家黃炎培適時在新加坡，其日記特別提及，他於 1919 年 3 月 20 日向「周領事借閱《時事新報》」，隔日（1 月 21 日）日記寫下「續閱《時事新報》（2 月 13 日）……同日，張君勱有《海外中華族之前途》」。[81]

然而從思想史脈絡看，馬來亞於 1930 年代出現了「建國」與「認同當地」的思潮，梁啟超這一思想主張似乎隱然與此有關。1932 年 7 月 1 日，一位名為南飆的作者於上海

[79] 同前註。
[80] 同前註。
[81] 見《黃炎培日記》卷 2，同註 31，頁 51。

出版了《南洋華僑獨立建國之理論及其戰略》，其基本思路不脫梁啟超以上所論。此書註明是「光獻給在英法荷等政府服務的中國人」，他指責香港與新加坡英國政府之所以可以鎮壓中國人的反抗，必須歸功於中國人的公務員，即協助英國人緝拿反抗者。此書也指責華人遺傳了民族劣根性，呼籲南洋華僑「獨立建國」，而這必須先具有「新觀念」，即求取向外擴大，而他認為這乃「天賦特權」。作者自我調侃自己是「神經病」，但指出獨立建國是「五十年後也會絕對必須成為事實的可能」。作者指出，中國人缺乏不做奴隸的自覺，「缺乏政治方面的能力」，他們還錯誤地無法拋棄「衣錦還鄉」的觀念，把自己當著一個做客他鄉的「田客人」，他認為「與土人聯合建國只是最平庸的工作」。這其實與以上梁啟超、張君勱所言一致。作者也認為，四十年來華僑響應孫中山的救國運動完全失敗，自身在南洋也面對各種壓迫，是時候「自救，只有先自救方足以就祖國」，並指出獨立建國是「歐戰後國際的新例」，華人必須自覺自己是南洋群島真正的主人翁，因為這是完全合理的。[82]同樣的，作者也以馬來半島華僑人口數量為立論前提，認為中國人可自認為「南洋群島的第二主人」，而若從「經濟的組織和市鎮工商進展的普遍看來」，他們更是主體。[83]作者進一步闡述其「政治理論依據」，認為「國家的形成是由大群公共利益的維繫而產生，所以國家合理的組織必屬於國家中的人民，這樣才不會違背組成國家的目的」,[84]同時指出「沒親眼見過的是不能置信」華僑在南洋的經濟實力的，而歐戰後以民族自決的本位進而組織當地人民，才能保護人民利益。然而，相對與於 1930 年成立、亦已強調「獨立建國」的馬來亞共產黨不一樣的是，他反對共產黨，認為「蘇維埃式的政府，在南洋無成長的餘地」,「南洋的經濟狀態，可以打破蘇俄謬誤的迷夢」。[85]然而顯然的，作者同樣誤解了華僑在馬來亞的人口優勢，與梁啟超、張君勱意見有思想脈絡上的一致性。

實際上，「此時此地」即是 1930、1940 年代之後逐漸興起於馬來亞華人社會的重要概念。上述馬來亞共產黨之成立，即以解放馬來亞殖民統治為鬥爭目的，[86]而隨著左翼文人南來，文學應該反映本土情境的「此時此地」獨特性論戰亦爆發於 1940 年代，[87]此一概念遂主導了馬華文學與思想的發展。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梁啟超的「此時此地」之見，可說是這一思想概念的系譜。然而，儘管它在 1930 年代主導了文學與思想界，卻不是華人參政的主流。要到二戰之後，直至 1950 年代馬來亞即將獨立之時，整體

[82] 南飆：《南洋華僑獨立建國之理論及其戰略》（上海：圖南書局，1932），頁 3-8。
[83] 同前註，頁 12。
[84] 同前註，頁 14-15。
[85] 同前註，頁 17。
[86] 參 Yong C.F.,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1997）.
[87] 參黃錦樹：《現實與詩意：馬華文學的欲望》中一章〈「此時此地的現實」：重探「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台北：麥田出版社，2022），頁 37-67。

華人才意識到「獨立建國」的參與政治以及自身在新興國家之「存在的合法性」與「公民」地位乃當務之急，「被動的尷尬」才被打破。[88]以此論之，梁啟超以上的呼籲超前於當時的馬來亞華僑，但又是基於「所見都是華人」之誤知使然。但顯而易見的是，與後來的左翼所強調的「此時此地」相比，儘管二者看來似乎有思想上的系譜關係，但層次上卻不可同日而語。左翼強調的是階級、反殖，但卻不是現代政治概念下極為重要的「公民」與政治參與概念。

五、結論

綜上所述，1899 年梁啟超流亡日本，這一方面使他暫時告別直接政治，一方面則為他的思想提供了開展的條件。在這一過程中，其視野開始納入華僑與華僑集中之地——南洋，華僑成為他《新民說》論述的部分基礎，提供他對比中西之間的國民性異同的實例。他先是稱讚華僑「富於自治之力」、「有冒險獨立之性質」，撰寫了中國歷史上全部來自南洋的「中國八大殖民偉人」，將華僑出洋歷史誤讀為「華人殖民史」，後又批評華僑仍保有中國人過於偏重「私德」的觀念，缺乏自治能力，只是「族民」，而不能成為「市民」。然而，這些讚語或批語都與他的《新民說》與「國民」、「國家」觀有關，但在 1919 年他歐遊過境新加坡與檳榔嶼時，其「南洋」理念發生了重大轉折。

從華人凝聚海港而震撼於「都是華人」，故而「發生」了他與歐遊同伴在船上對此一「震撼」之討論，竟從而造成他從把華僑視為「殖民」的觀點轉變為呼籲華僑關心「此時此地」，提出了以「公民」身份參與當地建立新國與政治的看法。但是，這一轉變可說是梁啟超自身《新民說》的內在轉變，仍不脫其基本思想實質，即要求中國人或華僑成為「新民」，內在化自由、市民、公民等所謂的「公德」價值，以建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但是，基於一種誤解或者想像——對人口數目的誤解、昧於馬來亞政治的複雜性、震撼於馬來亞華人的實際實力——他「想像」了華人可以成為新國家的核心「公民」，這超出了馬來亞華人當時所普遍具有的政治水平與想像。馬來亞華人直至 1930 年代，終於出現「此時此地」的思潮，然而遲至 1950 年代馬來民族主義獨立建國思潮興起後才整體上發生集體的「此時此地」政治認同轉向，並為此滯後現象付出代價。[89]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梁啟超的呼籲可說是馬來西亞華人這一思想脈絡的系譜源頭，而且

[88] 詳見許德發，《在承認與平等之間——思想視角下的「馬華問題」》（台北：時報，2022），頁 82。

[89] 此滯後造成馬來西亞華人獨立前後面對了身份政治的困境，成為「二等公民」，相關論述可參見許德發著《在承認與平等之間——思想視角下的「馬華問題」》。

實已遠遠超出了曾跨越二戰前後以左翼思潮為核心的「階級」在地化建國運動，因他揭櫫的是——仍極具當代意義的、具有「公民」性質的在地身份認同建構。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Manjit S. Sidhu and Gavin W. Jones, Population Dynamics in a Plural Society：Peninsular Malaysia, Kuala Lumpur：UMCB Publication, 1981.

Sharon Carsten，〈從神話到歷史——葉亞來和馬來西亞華人的英勇的過去〉，李業霖編《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7年。

Yong C.F.,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文崇一：〈新加坡華人社會變遷〉，《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28 期，1969 年。

王亞生、劉勁松：〈略論梁啟超華僑華人研究之成就〉，《前沿》，第 18 期，總第 320 期，2012 年。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王慷鼎：〈康有為南遊詩中「丹將敦島」考〉，《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報》，第 1 期，1997年。

王　峰：〈梁啟超著作中的海外華人〉，《蘭台世界》，第 20 期，2016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卷 2，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年。

李安山：〈明清時期有關華僑華人的典籍筆記和研究概述〉，《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 2期，2002 年。

李安山：〈中華民國時期華僑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第 4 期，2002 年。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2000 年。

南　飆：，《南洋華僑獨立建國之理論及其戰略》，上海：圖南書局，1932 年。

桑　兵：《勤王庚子與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

陳緒石：〈梁啟超的華僑國民性研究與「五四」國民性批判思潮〉，《學術探索》， 第 11期 ，2019 年。

陳桃霞：〈新地理文化空間的發現與開拓——以梁啟超等作家南洋遊記為中心的考察〉，《學術探索》，第 1 期，2018 年。

張人鳳：〈1900–1901,康有為在南洋——讀邱菽園後人王清建先生藏康有為致邱菽園信函及其他歷史文獻〉，*BIBLIOASIA*， 9.3, Oct–Dec.2013。

張君勱：〈海外中華民族之前途〉，《時事新報》第 1 版，1919 年 2 月 13 日。

張品興編：《梁啟超家書》，北京：文聯出版社，1999 年。

張　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年。

梁啟超著，湯志钧、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 4 集，論著 4，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

許德發：《在承認與平等之間——思想視角下的「馬華問題」》，台北：時報，2022 年。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

黃錦樹：《現實與詩意：馬華文學的欲望》，台北：麥田出版社，2022 年。

趙令揚：〈辛亥革命期間海外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的看法——梅光達，邱菽園與康梁的關係〉，《近代史研究》，第 2 期，1992 年。

蔡少卿：〈梁啟超訪問澳洲論述〉，《江蘇社會科學》，第 2 期，2018 年。

鄭大華：《張君勱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顏　敏：〈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南洋敘述〉，《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 2 期，2023 年。

〈梁任公之游轍〉，《新國民日報》，第 6 頁，1919 年 1 月 11 日。

WORKS CITED

Cai, Shaoqing. "Liang Qichao fangwen Aozhou lunshu" ["A Discussion on Liang Qichao's Visit to Australia"]. *Jiangsu shehui kexue*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no. 2, 2018.

Carsten, Sharon. "Cong shenhua dao lishi: Ye Yalai he Malaixiya Huaren de yingyong de guoqu" ["From Myth to History: Yap Ah Loy and the Heroic Past of Malaysian Chinese"]. *Jilongpo kaitaozhe de zuji: Jiabidan Ye Yalai de yisheng* [*Footprints of Kuala Lumpur's Pioneers: The Life of Kapitan Yap Ah Loy*], edited by Yelin Li, Huashe yanjiu zhongxin, 1997.

Chen, Taoxia. "Xin dili wenhua kongjian de faxian yu kaituo: Yi Liang Qichao deng zuojia Nanyang youji wei zhongxin de kaocha"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New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Space: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Nanyang Travelogues of Liang Qichao and Other Writers"]. *Xueshu tansuo* [*Academic Exploration*], no. 1, 2018.

Chen, Xushi. "Liang Qichao de Huaqiao guominxing yanjiu yu 'Wu Si' guominxing pipan sichao" ["Liang Qichao's Stud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May Fourth Trend of National Character Critique"]. *Xueshu tansuo* [*Academic Exploration*], no. 11, 2019.

Ding, Wenjiang, and Fengtian Zhao, editors. *Liang Qichao nianpu changbian* [*A Detailed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iang Qichao*]. Renmin chubanshe, 1983.

Huang, Jinshu. *Xianshi yu shiyi: Mahua wenxue de yuwang* [*Reality and Poetics: The Desires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Maitian chubanshe, 2022.

Huang, Kewu. *Yige bei fangqi de xuanze: Liang Qichao tiaoshi sixiang zhi yanjiu* [*An Abandoned Choice: A Study of Liang Qichao's Accommodative Thought*].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2006.

Li, Anshan. "Ming Qing shiqi youguan Huaqiao Huaren de dianji biji he yanjiu gaishu" ["An Overview of Ancient Books, Notes, and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qiao Huaren lishi yanjiu*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2, 2002.

Li, Anshan. "Zhonghua minguo shiqi Huaqiao yanjiu shuping" ["A Review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Jindaishi yanjiu*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4, 2002.

Liang, Qichao. *Liang Qichao quanji*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 vol. 4. Edited by Zhijun Tang and Renze Tang,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18.

"Liang Rengong zhi youche" ["The Travel Tracks of Liang Rengong"]. *Xin guomin ribao* [*New National Daily*], 11 Jan. 1919, p. 6.

Nan, Biao. *Nanyang Huaqiao duli jianguo zhi lilun jiqi zhanlve* [*The Theory and Strategy of the Independent Nation-Building of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Tunan shuju, 1932.

Sang, Bing. *Qinwang Gengzi yu wan Qing zhengju* [*The 1900 Royalist Movement and the Late Qing Political Situation*]. Beijing daxue, 2004.

Shen, Songqiao. "Zhen Dahan zhi tiansheng: Minzu yingxiong xipu yu wan Qing de guozu xiangxiang" ["Rousing the Heavenly Voice of the Great Han: The Genealogy of National Heroes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indaishi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no. 33, 2000.

Sidhu, Manjit S., and Gavin W. Jones. *Population Dynamics in a Plural Society: Peninsular Malaysia*. UMCB Publication, 1981.

Wang, Fansen. *Zhongguo jindai sixiang yu xueshu de xipu* [*The Genealog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Scholarship*]. Hebei jiaoyu chubanshe, 2001.

Wang, Feng. "Liang Qichao zhuzuo zhong de haiwai Huaren" ["Overseas Chinese in Liang Qichao's Writings"]. *Lantai shijie* [*Lantai World*], no. 20, 2016.

Wang, Kangding. "Kang Youwei nanyou shi zhong 'Danjiangdundao' kao" ["A Textual Research on 'Danjiangdundao' in Kang Youwei's Poems from His Southern Tour"]. *Malaixiya Huaren yanjiu xuebao*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no. 1, 1997.

Wang, Yasheng, and Jinsong Liu. "Lvelun Liang Qichao Huaqiao Huaren yanjiu zhi chengjiu"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chievements of Liang Qichao's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Qianyan* [*Forward Position*], no. 18, 2012.

Wen, Chongyi. "Xinjiapo Huaren shehui bianqian" ["Social Changes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Minzuxue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no. 28, 1969.

Xu, Defa. *Zai chengren yu pingdeng zhijian: Sixiang shijiao xia de "Mahua wenti"*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Equality: The "Malaysian Chinese Problem" from an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Shibao, 2022.

Yan, Min. "Wan Qing yuwa youji zhong de Nanyang xushu" ["The Narrative of Nanyang in Late Qing Overseas Travelogues"]. *Shijie Huawen wenxue luntan* [*Forum for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no. 2, 2023.

Yong, C. F.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Zhang, Hao. *Liang Qichao yu Zhongguo sixiang de guodu (1890-1907)* [*Liang Qichao and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Thought (1890-1907)*].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1995.

Zhang, Junmai. "Haiwai Zhonghua minzu zhi qiantu" ["The Futu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 *Shishi xinbao* [*The China Times*], 13 Feb. 1919, p. 1.

Zhang, Pinxing, editor. *Liang Qichao jiashu* [*Family Letters of Liang Qichao*]. Wenlian chubanshe, 1999.

Zhang, Renfeng. "1900–1901, Kang Youwei zai Nanyang: Du Qiu Shuyuan houren Wang Qingjian xiansheng cang Kang Youwei zhi Qiu Shuyuan xinhan ji qita lishi wenxian" ["1900-1901, Kang Youwei in Nanyang: Reading Kang Youwei's Letters to Khoo Seok Wan and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Collected by Khoo Seok Wan's Descendant Mr. Wang Qingjian"]. *BiblioAsia*, vol. 9, no. 3, Oct.-Dec. 2013.

Zhao, Lingyang. "Xinhai geming qijian haiwai Zhongguo zhishifenzi dui Zhongguo geming de kanfa: Mei Guangda, Qiu Shuyuan yu Kang Liang de guanxi" ["Views of Overseas Chinese Intellectual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i Guangda, Khoo Seok Wan,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Jindaishi yanjiu*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2, 1992.

Zheng, Dahua. *Zhang Junmai zhuan* [*Biography of Zhang Junmai*]. Shangwu yinshuguan, 2012.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editor. *Huang Yanpei riji* [*Diary of Huang Yanpei*], vol. 2. Huawen chubanshe, 2008.